

学术专论

# 清代广州贸易中的法国商馆

解江红

〔摘要〕法国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的海外贸易竞争中不甘落后，借助政府支持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并在广州设置商行处理各种事务。法国商行的设立、发展及最后的关闭，与法国在国际上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及国内革命形势和贸易政策密切相关，它经历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同样的命运，即起初在对华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在18世纪末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本文依据原始文献对这一时期来华法国船只的数量以及法国商馆的管理人员名单进行统计，力图清晰呈现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法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

〔关键词〕法国东印度公司 广州贸易 法国商馆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7)-02-0099-14

17世纪时，法国的国力逐渐增强，波旁王朝统治者在位期间都极力恢复和平，修养生息，其后经过主教大臣黎塞留和马扎然的大力整顿，到路易十四亲政时期，法国的专制王权达到了极盛，于是开始大力拓展海外贸易。国王下令建立庞大的舰队和商船队，成立贸易公司，以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法国东印度公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公司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取得了丰厚的利润，船只及人员往来日渐频繁，这就促使其在广州设立固定的商务办事处，处理每年法国船只来华的贸易事务。众多学者（如梁嘉彬、黄启臣、彭泽益、李国荣等）都对明清时期广州的行商有所关注，也发表了若干研究成果，但他们对法国商馆所涉及的内容却较少注意。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权不支持海外贸易，将相关档案予以销毁，使得保留下来的档案不多。法国东印度公司原始文献资料的匮乏，导致其相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本文依据法国海外国家档案馆涉及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的9卷档案<sup>①</sup>，再结合高第（Henri Cordier）收集的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情况的原始资料<sup>②</sup>、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最后一任商务代表贡斯当

〔收稿日期〕2016-12-10

〔作者简介〕解江红（1976-），女，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讲师，广州51063；xiejiahong@163.com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一般项目“清代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团的史料整理及研究”（项目号：GD16CLS01）的成果。

① FR ANOM C<sup>1</sup> 8-16,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Mer.

② 1883年，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收集了法国国家档案（Archives Nationales）、海外及殖民地档案（Archives de la Marine et des Colonies）、外交部档案（Archives du Départemen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中有关法国印度公司在华的贸易情况出版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在中国》（*La France en Chine au dix-huitième siècle*, Ernest Leroux, 1883.）。本文所参照的资料即为高第收集整理的六卷本，题为“东印度，中国，交趾支那”。其中有关中国的文档共三卷，大部分是有关东印度公司及广州商馆的文件，主要是从1770年10月至1814年9月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状况；其余三卷的文献资料是有关交趾支那（不到两卷）、秘鲁及暹罗。

(Charles de Constant) 的回忆录<sup>①</sup>以及莫亥莱 (Abbé Morellet)<sup>②</sup>、德尔米尼 (Louis Dermigny) 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对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管理机构——广州法国商馆进行研究, 以期增进我们对 18 世纪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状况, 及其代理机构的建立、成员构成、活动内容等方面的了解, 进而对清代中外关系的研究有所助益。

## 一、法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

第一家拥有对印度贸易专利特许权的法国公司成立于 1604 年。由于在最初两次航海贸易中交易的商品不需缴纳任何税费, 故其获利颇丰, 不久后这家公司又得到了前往印度贸易的 15 年专利特许权。但直到 1611 年, 该公司都并未进行前往印度的航海活动,<sup>③</sup> 其后也只是在 1624 到 1635 年间去印度和马达加斯加进行了几次试航。1664 年, 接替富凯 (Nicolas Fouquet) 担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勒贝尔 (Jean-Baptiste Colbert) 正式创办了东印度公司 (La Compagnie des Indes orientales ou La Compagnie française pour le commerce des Indes Orientales)。在法王路易十四的授权下, 该公司享有从南非好望角开始, 在整个印度、东海、南海为期 50 年的贸易特许权, 在其徽章上印有它的拉丁文格言 “Floredo quocumque ferar” (所到之处皆繁荣)。这是一个商业组织, 目的是为了与英国和荷兰争夺在印度的利益。

东印度公司虽然曾经吞并过本国的一家中国商业公司, 但是自 1664 年成立后的 30 年间, 并没有派遣一艘船只前往中国进行贸易, 直到 1698 年才开始试行。当年, 法国富商儒尔丹 (Jourdan)<sup>④</sup> 费尽周折, 几经努力从东印度公司得到向中国派遣商船进行贸易的许可, 但条件是要将 5% 的商品利润上交。<sup>⑤</sup> 这艘 400 吨吞吐量的巨轮——“安菲特利特号” (*l' Amphitrite*, 法文意为“海洋女神”), 在拉罗克骑士 (Chevalier de la Roque) 的指挥下, 于 1698 年 3 月 6 日从拉罗谢尔 (La Rochelle) 起航, 在 1698 年 11 月到达广州水域。1700 年 1 月返航, 1700 年 8 月回到路易港。<sup>⑥</sup> 这是严格意义上第一艘前来中国进行贸易的法国商船。“安菲特利特号” 首航获得的利润让法国政府和商人看到了在东方中国的极大商机, 儒尔丹也大受鼓舞, 他随后组建了一个新的中国商业公司 (La Compagnie de la Chine)。东印度公司以 25 000 利弗尔 (livres) 将印度贸易特许权转让给这个新公司, 但同时规定该公司不得在印度境外任何地方从事商业贸易, 也不得在其他分行处停泊靠港。这时的法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法国与荷兰之间爆发战争等原因而濒临破产。1719 年 5 月, 约翰·劳<sup>⑦</sup>将西方公司 (la Compagnie d' Occident)、印度公司 (la Compagnie

---

① 贡斯当 (Charles de Constant, 1762 – 1835) 在 1779 年至 1793 年间曾三次来到广州, 前后居住时间长达 8 年, 曾担任法国东印度公司大班, 后来担任法国商馆代表, 他通过大量的手稿及信件将自己经历和了解的贸易状况记录下来。1964 年由德尔米尼整理成《夏尔·贡斯当中国贸易回忆录》(*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à la Chine*, S. V. E. P. E. N., 1964) 出版。

② 莫亥莱 (Abbé Morellet, 1727—1819), 18 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编委之一, 1785 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769 年出版了《印度公司现状录》(*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Chez Desaint, 1769)。

③ Abbé Morellet, *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Chez DESAINT, 1769, pp. 10 – 11.

④ 儒尔丹: 历史上对这位富商并没有过多的记载, 我们仅可在一些有关东印度公司的记载中找到有关他的只言片语: 儒尔丹是一位富有的工业主、大玻璃制造商。(Claudius Madrolle, *Historique de la Chine*, Extrait des *Guides Madrolle : Chine*, Comité de l' Asie française, 1904, p. 34.)

⑤ Abbé Morellet, *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p. 17.

⑥ Pelliot Paul, “L' origin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a Chine : Le premier voyage de l' Amphitrite en Chine”, 1<sup>ère</sup> partie, *Journal des savants*, Volume 10, numéro 1, 1928, pp. 433 – 434.

⑦ John Law (1617—1729), 苏格兰货币改革家, 后为法国服务, 开发法属美洲领地的“密西西比计划”的制定者。

d’Indes) 和中国公司 (la Compagnie de la Chine) 合并组成东印度公司，其特许经营权持续到 1770 年。由于商业贸易合作的国家政局不稳定以及英国海外贸易霸权的崛起，东印度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不佳，其商业资本和收益每年都在下降，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与中国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却获益丰厚。莫亥莱依据东印度公司的账本，列举了 1725 至 1768 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中取得的逐年利润额。根据莫亥莱的数据<sup>①</sup>，笔者进行了统计（表 1）：

表 1 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所得利润表（1725 – 1768）

年份	在法国销售总额 (利弗尔)	购买额 (利弗尔)	净利润额 (利弗尔)	利润百分比
1725 – 1736	18 961 488	9 272 899	9 688 549	104%
1736 – 1743	23 602 112	9 779 705	13 822 407	141%
1743 – 1756	41 695 974	19 252 520	22 443 427	116%
1764	5 173 666	2 796 480	2 377 186	85%
1765	4 429 615	2 427 366	2 002 249	82%
1766	7 130 910	4 157 696	2 973 214	71%
1767	5 055 716	3 013 340	2 042 376	68%
1768	5 838 379	3 481 891	2 356 488	67%

从该表可以看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东印度公司起初获利极为丰厚，在 1736—1743 年间利润达到 141%。这种形势在 1756 年发生了变化，在 1756—1763 年间，由于法国在与英国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中失败，印度公司的贸易受到重创。但直至 1768 年，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法国东印度公司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收益。可见其利润变化与法国在海外霸权中的力量消涨息息相关。1723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亲政，他继承了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法国遭到惨败，失去了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路易斯安娜、塞内加尔等地的商站，在印度也丢掉了大片殖民地。七年战争使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而法国的强国地位严重受损。这场战争令法国的海外贸易受到重创，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与中国的贸易。1769 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在财产清算后解散，法国的商业贸易向个体商人开放，在广州的商站由法国国王授权的王室管理委员会接管。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规定广州是允许西洋外商来华贸易的唯一口岸。在这种形势下，法国政府为了处理对华贸易事务，在广州设立了商馆（le Hang français）。随着东印度公司的重组，商馆的管理机构及人员也随之发生了变动，从东印度公司管理会转为王室管理委员会，为前来广州进行贸易的法国商船提供服务，解决纠纷，并记录广州黄埔港的相关情况，兹不妨举例说明。

在 1772 年王室管理委员会写给海军部长的信中就提到当年有若干海外船只来到广州，其中 13 艘来自欧洲的英国，2 艘来自孟加拉，1 艘来自孟买，3 艘来自荷兰，2 艘来自瑞典，2 艘来自丹麦，1 艘来自欧洲的葡萄牙军舰，3 艘来自法国。<sup>②</sup> 柯西尼在他的回忆录也提到：

我们次日到黄埔港时，发现有六艘英国船，六艘荷兰船，一艘丹麦船，三艘瑞典船和一艘法国船停泊。过了几日后，又来了几艘法国、英国和丹麦船只。<sup>③</sup>

1773 年管理会在“卡斯特里号”（Castries）商船回法国时带去的信件中提及本年有 6 艘法国私人商船来到广州进行贸易<sup>④</sup>：

船长维斯龙（Winslow）率领一支从马拉巴尔海岸出发的舰队于 7 月 23 日到达广州；船

① Abbé Morellet, *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pp. 125 – 126.  
②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Ernest Leroux, 1883, p. 8.  
③ Charpentier Cossigny, *Voyage à Canton, Capitale de la Province de ce nom, à la Chine, par Gorée, le Cap de Bonne – Espérance, et les îles de France et de la Réunion*, p. 72.  
④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pp. 26 – 27.

长拉伯理士莱（La Briselaine）驾驶“海豚号”（Dauphin），途经法国岛（毛里求斯）于8月29日到达广州；船长奥莫拉（Omerat）于9月3日驾驶“博蒙号”（Beaumont）也经过同样的路线来到广州；“坡拉斯林公爵号”（Duc de Praslin）由克拉阿德骑士（chevalier de Clouard），即国王船队副手驾驶，途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和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于9月16日来到广州；“柏立松号”（Brisson），船长为柏图（Bertaud），从拉罗谢尔（La Rochelle）出发，经法国岛于9月20日到达；“卡特琳娜号”（Catherine），在法国岛由拉罗彻特租用，船长顾耶（Duclos Guyot）率船于9月30日到达黄埔港。

由于所载货物质量极佳，且当年只有9艘英国船只携带货物回到欧洲，所以可想而知，这6艘返回法国的商船必定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在1774年管理委员会写给海军部长的报告中列举了6艘法国船只来到黄埔港：

“恒河号”（Gange），船长为若栏（Gelin），经马拉巴尔（Malabar）和本地治里（Pondichéry）来到澳门；“布罗格利公爵号”（Duc de Broglie），从法国直接来到澳门；“卓越号”（Superbe），皇家船队大副德韦尼（De Vigny），跟随布罗格利号从法国直接来到澳门；“本地治里号”（Pondichéry），船长为刺莫特（Lamotte），经马拉巴尔和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停泊于黄埔港；“菲茨詹姆斯号”（Fitz-James），船长为皮埃莱（Pierres），从圣马洛（St-Malo）和法国岛驶来停泊于黄埔港；“美洲人号”（Amériquain），船长为尚特鲁（Chantelou），从圣马洛和加地斯（Cadix）驶来，也停泊于黄埔港。<sup>①</sup>

1770年，法国的自由贸易向个体商人解禁后，前来中国的法国贸易船只也有所增加，当然，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商船相比，数量并非最多，但也占据了一定的份额：1773年黄埔港停泊有6艘法国船，19艘英国船，4艘荷兰船，1艘瑞典船和2艘丹麦船<sup>②</sup>；而1776年黄埔港停泊的25艘船中，法国船有4艘，其余的是4艘荷兰船，2艘瑞典船，3艘丹麦船，13艘英国船（5艘来自欧洲，8艘来自印度）。康波曾统计出，1698年至1769年间，东印度公司曾派遣110艘船到中国进行贸易，其吨位多在550—600吨间；而在私人贸易期间大致派遣了40艘船，<sup>③</sup>但对随后的情形语焉不详。1964年，法国学者德尔米尼出版了研究东印度公司的巨著——《中国与西方：18世纪广州的对外贸易（1719—1833）》，在第二卷中列举了自1719年至1833年间前来广州黄埔港的欧美各国船只数量。本文据此对来华贸易船只总量、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及法国商船的数量进行了统计（表2）：<sup>④</sup>

表2 1719—1833年黄埔港往来西方船只统计表

起止年限	法国船只数量 (艘)	英国船只数量 (艘)	西方国家来往 广州船只总量 (艘)	所占百分比	
				法国	英国
1719—1769	106	377	769	14%	49%
1770—1778	45	159	278	16%	57%
1779—1833	56	2 607	4 112	1.4%	63%

从上表可以看到，在1778年前，法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船只数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相比，大约是其数量的三分之一，约占欧美船只总量约六分之一左右。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法国的海外贸易霸权遭到了挑战，这在前来广州贸易的船只数量也得到了体现。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欧洲各国与英国在海上贸易方面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纠纷。法国在“七年战争”中

① Ibid. , pp. 28 – 29.

② Ibid. , pp. 22 – 23.

③ 康波：《法国东印度公司与中法贸易》，《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

④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e siècle, 1719 – 1833*, tome II, S. E. V. P. E. N. , 1964, pp. 521 – 525.



被英国夺取了诸多海外殖民地，无时无刻企图复仇。趁此机会，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下令参加战争，英国开始拦截法国和西班牙在海上的货船，导致前来中国贸易的船只也受到影响。因此，1778 年到 1782 年，几乎没有任何一艘法国商船来到黄埔港。1789 年，法国国内爆发了大革命，大革命政权和随后的法兰西帝国不支持法国海外商业机构的发展，法国商船前来黄埔港的数量就急剧下降，只占到 1.4%。但毕竟在 1778 年前，法国是除了英国外与中国贸易最活跃的欧洲国家，在一些法国航海家或大班的回忆录里，我们也可以找到有关当时贸易的记录。柯西尼<sup>①</sup>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所有欧洲人来到这里时，都会对这样的场景印象深刻。大量的船只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河岸入口处设有多处关卡，对河口进行防御，防止偷税漏税……。船一停泊至黄埔港，就有海关人员乘两艘中国船只来到船旁，上船检查。所有的货物都得付进出关税，也有些货物是禁止的，例如带入鸦片、运出白银。海关人员会发放一张通行证，任何物品在没有得到许可之前是不能卸货的。<sup>②</sup>

大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惊人，农业生产也随之扩大增强。与欧洲人的贸易促进了茶叶、桑蚕及棉花的种植业，也让丝绸制造业和其他相关产业发达兴旺。本土人口的增长与文化和制造业形成了良性循环。<sup>③</sup>

法国东印度公司就如同其他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所交易的货物大多是茶叶、丝绸、南京布、瓷器等等。广州位于珠江口，可以容纳大量船只航行，因而是欧洲船只前来贸易的主要目的地，其贸易的主要货物就是茶叶、瓷器、生丝、丝织品、漆器、画纸和其他物品。<sup>④</sup>“（贸易）禁令后来仅仅限于禁止鸦片进入帝国，玻璃进出口以及黄金、白银和大米的出口。”<sup>⑤</sup>柯西尼也谈到另外一种交易货物——毛皮，“由于广州的气候缘故，冬季风大寒冷，但屋内一般都没有诸如暖炉或壁炉的取暖设施，因而人们都喜欢穿皮衣，尤其是水獭皮，但是其非常稀有和昂贵。自从美洲大陆发现后，这种毛皮就显得很普遍了，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在广州售卖的毛皮柔软雪白，应该是某种类似白鼬的山猫皮。”<sup>⑥</sup>不过，随着中国市场需求，欧洲商人为追求更高的商业利润，也开始迎合中国消费者的需求来运载货物。1779 年，中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就有：呢绒、织物（兰斯或勒芒、羽纱等）、矿物（铁或杂青金石）、玻璃制品、铅、乌木（法兰西岛的）、胡椒、香檀木、鸦片、香料、棉花、海参、木香、犀牛角、漆、燕窝、锡，而出口欧洲的商品则包括各类茶叶（乌龙茶、功夫红茶、色种、饼茶、小种红茶、白茶等）、瓷器、丝绸（包括广东和苏州生丝）等。<sup>⑦</sup>1782 年一艘荷兰公司装载的丹麦货船就在巴塔维亚购买货物，然后满载胡椒、丁香、肉豆蔻、鱼翅、燕窝、白银和黄金等物来到广州进行贸易。<sup>⑧</sup>

法国与中国在 18 世纪的海上贸易受到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安菲

---

① Joseph-François Charpentier de Cossigny (1736—1809)，曾经担任过东印度公司的机械工程师，并在广州的法国商馆居住。他从 1751—1752 年就来中国做过科学航行，此后多次来到广州。他在 1798 年写的回忆录中对广州的城市面貌、人口、贸易状况做了详细描述。

② Charpentier Cossigny, *Voyage à Canton, Capitale de la Province de ce nom, à la Chine, par Gorée, le Cap de Bonne - Espérance, et les îles de France et de la Réunion*, pp. 72 - 73.

③ Ibid., pp. 143 - 144.

④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p. 67.

⑤ Charpentier Cossigny, *Voyage à Canton, Capitale de la Province de ce nom, à la Chine, par Gorée, le Cap de Bonne - Espérance, et les îles de France et de la Réunion*, p. 142.

⑥ Ibid., pp. 147 - 148.

⑦ Louis Dermigny, *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à la Chine*, S. V. E. P. E. N., 1964, pp. 191 - 255.

⑧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p. 154.

特利特号”首航开拓的美好局面，让法国在 80 年间西方诸国与华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但随着在国际战争中的失利及国内革命的爆发，形势发生了变化，来华贸易的船只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相比，渐显颓势，在 18 世纪后期及 19 世纪初期几乎完全退出了海外贸易的舞台。而作为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华的代理机构——法国商行，也经历了从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Conseil de direction）、王家管理委员会（Conseil de direction du Roi）到领事馆（Consulat），再到无奈谢幕的过程。

## 二、法国商行管理机构的变迁及主要负责人

1719 年组建的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置了一个管理委员会。杜蒙（Dumont）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由他处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成员有米歇尔（Michel）、特洛里（Trollier）、狄默德（Thimotée）、劳郎斯（Laurenci）、吉贝尔（Gilbert）、沃克兰（Pierre-Charles François Vauquelin）及外科军医伯勒格尔（Beauregard）。1768 年 12 月，曾经作为印度公司商船“迪拉斯公爵号”（Duc de Duras）大班的德罗卞（De Robien）担任委员会秘书。<sup>①</sup>该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的贸易特许权为 50 年。1769 年印度公司的特许权被撤销后，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大都被解雇，只有第二任大班狄默德随后成了商行负责人，与德罗卞、克鲁埃（Clouët）、考斯特（Paul François Costar）组成了一个新的委员会——王家管理委员会。<sup>②</sup>随后不久狄默德被召回并由德韦尼（De Vigny）暂时代理职务。1770 年，年仅 35 岁的德罗卞就破格成为第三任大班及广州商行负责人。而按常规，在法国东印度公司，一般职员要到 45 或 50 岁时才有机会进行申请这样的职位。不料狄默德在 1772 年返回东印度公司并重掌大权，同年外科军医伯勒格尔被撤职，由德斯图莱尔（Destourelles）担任商行的外科医生，后又由巴里（Paris）接任。狄默德虽然回到商馆，但是健康状况不佳，一应事务仍是由德罗卞处理。

1776 年以前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置的商行都是由王家管理委员会负责，主要活动是在中国着手购买货物，提前为每年东印度公司船只准备运送的货物，同时保护法国与外国商人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利益，并维持中国政府给予法国商船的优待政策。但事实上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事务完全被中国的中介商垄断经营，因而广州的法国商行主要处理本国人交易过程中的争端，并进行裁决，维护公司在中国的商业贸易。1769 年后，法国国内的自由贸易声浪愈来愈高，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的专营权也已到期，大批个体商人在国家组织下开始前往中国的贸易。仅在 1769 年至 1776 年七年中，就有 36 艘法国船只来到黄埔港<sup>③</sup>，每年平均有五六艘船只，法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日渐活跃，事务纷杂，王室管理委员在管理时渐渐力不从心。

1776 年 2 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决定仿照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Surate）建立分行的经验，将管理委员会改为领事馆，由一名领事和书记官组成，负责调解纠纷，维护本国商人之间及其与欧洲其他国家商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法王起初下令任命狄默德为领事，但他因健康原因放弃，领事馆第一任领事沃克兰遂于 1776 年 2 月上任，并由克鲁埃担任书记官。<sup>④</sup>3 月 2

---

① P. Huard & Ming Wong, “Pierre – Louis – Anchille de Robien, chevalier de Robien, dit ‘le chinois’”, 1736 – 1792”, *Annales de Bretagne*, Tome 70, No. 3, 1963, pp. 274 – 275.

② FR ANOM C<sup>1</sup> 13 folios 49 – 68,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 – mer ; Abbé Morellet, *Mémoire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la Compagnie des Indes*, Chez DESAINT, 1769, p. 202.

③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1719 – 1833*, Tome II, pp. 522 – 523.

④ FR ANOM C<sup>1</sup> 13 folio 5,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 – Mer.

日国王又下达 23 条条例，规定了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具体义务，限于篇幅，仅列举以下几条：

第 7 条：每年年末，在领事和两名公证员对领事馆收入及支出账目总表审核签字后，书记官或负责财务的职员须将副本寄往海军部的国务秘书。

第 9 条：领事在处理民事或刑事事件时，要极为谨慎，避免行事对贸易造成不便，引起中国政府猜忌。

第 10 条：所有来到广州的船只如果在此地遇到任何不法行为，都可以在领事面前陈述，进行判决。

第 15 条：领事有义务对海难中去世的法国人处理后事，清点其财产和证券票据，且须有领馆书记官及其他两位法国人在场签字证明。

第 22 条：所有在广州领事馆管辖范围内（广州、黄埔、澳门等港口）上岸的商船船主或船长都必须在到达后向领事出示商船航行许可证，递交航海报告，并在到达及离开时需拿到领事签署的证明书。<sup>①</sup>

从人事安排及规章制度来看，这个领事馆是由法国国王任命，承担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本国商人责任的一种官方机构。不过，清朝政府并没有把它视作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式外交机构，“只有在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争端时，才去找它”<sup>②</sup>。

于法国商馆在广州的具体位置，1769 年前来到中国的威廉·希基曾记录道：

从黄埔往城郊约半英里有一个码头或堤坝……每个商馆门前立一根高高的旗杆，升起本国的旗帜。我在中国的时候，它们的顺序是：荷兰第一，接着法国、英国、瑞典，最后是丹麦。<sup>③</sup>

高第也详细描述了法国商行的位置：

在人群密集的南郊，珠江左岸河南岛（île de Ho-nan）对面约 350 米长的地方，13 家商行（Che-san hang）面朝南方一字排开。西边第一家是丹麦馆，新中国街将其与一些中国商铺隔开；街对面是西班牙馆，其次是法国馆，与旧中国街路口的章（官）行（hang de Tchoung qua）紧挨着。<sup>④</sup>

由于被任命为领事的狄默德从 1773 年就身体不适，故其早就去意已决。而被任命为领馆书记官的克鲁埃，也在同年因病离开而前往了法国岛。<sup>⑤</sup> 1776 年 10 月 20 日法国国王下令任命沃克兰（Vauquelin，曾任印度公司商船大班，已前往中国数次）为领事；魏亚尔（Vieillard，现居中国，才能卓越）为领事馆书记官；发放 5000 piastres 作为领事馆的经费。沃克兰已经在东印度公司作为大班服务了多年，他在乾隆三十年（1765）就获得葡印总督的许可，在澳门居留，对中国文化习俗非常了解，是非常合适的领事人选；而魏亚尔曾协助德罗卞处理过东印度公司管理委员会事务，办事能力也得到众人肯定。法国商行在 1774 年德罗卞回国后就由魏亚尔、瑟毕尔（Sebire）和卢罗（Loureue）掌管，但后二者在 1777 年离开了中国，这样，法国商行就完全由魏亚尔和沃克兰负责。于是法国在广州的领事馆正式建立并开始发挥其为本国商人以及国家利益服务的职能。

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帝颁发了一系列有关广州对外贸易的管理条例。其中最令各国

①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pp. 69 – 74.

② [美]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2 卷，区宗华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61 页。

③ [英] 詹姆斯·奥朗奇：《中国通商图》，何高济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30—131 页。

④ Henri Cordier, “Les marchands hanistes de Canton”, *T'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3, No. 5, 1902, pp. 312 – 313.

⑤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在该卷档案中，附有医生出具的正式文书，并有公证员 Boucherat 及三位委员会成员 Thimotée, De Robien, Clouët 签字的文书。由此可见，他们二人确实是由于生病而离职，并非由于薪酬微薄。

大班们震惊的是他们在广州商馆的生活将受到限制。规定有五条，第一条即是：

船货如已卸清，大班等应立即回国，不得逗留广州。但商船必须依季候风行驶，往来有定期，故大班亦只有在此期间内回国。如有交易未了、账项未清者，得留居澳门，不必返回欧洲，以免奔波劳顿。<sup>①</sup>

澳门自从16世纪以来就有葡萄牙人居留，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事实上的殖民占领，中国对澳门仍然有着绝对统治权。从1582年直至1849年，葡萄牙人以付租金的形式居留于澳门，并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除了马赛的西班牙人以外的其他欧洲人都不得在澳门经商，澳门只能作为一处休闲暂栖之地。<sup>②</sup>18世纪广州法国领事馆的最后一任商务代表贡斯当（Charles de Constant）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在澳门的生活：

这些欧洲人每年2月至10月在澳门居住。我在那段时间里，有15至16名英国人，同样数量的荷兰人，3个瑞典人，3个丹麦人，3个法国人，3个奥匈帝国人，以及几个法国和英国个体商人。而居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个个游手好闲，没有任何正当职业，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生活放荡不堪，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的日子。<sup>③</sup>

中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商人于贸易期外在广州居住，法国广州领事馆的职员也不例外。领馆职员在澳门和广州两地的日常生活、房租、来回旅行花费就达到每年23 400利弗尔。不仅如此，1769年和177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贸易特许权到期后，东印度公司下令将法国在广州商行的全部家具和物品出售，这也大大增加了商馆在广州的费用。法国商行占据的房屋并不是东印度公司的产业，只有使用权，每年需交租金1150两（约合8625利弗尔）给房主——一位中国行商：

没有租约也无字据，每年船队离开时交租；在去澳门前，将留在商行里的所有家具和物品进行清点，由这个中国商人予以照看并保管所有钥匙。当欧洲第一批商船到达，大班们就从澳门返回，重新掌管商行及家具物品。<sup>④</sup>

沃克兰在1782年病逝之前，一直掌管着法国领事馆事务，但他一上任就遇到经费短缺的问题，他写信给海军部长将实情告知，请求增加拨款，或者授权他向前来领事馆管辖范围内作贸易的船只收取费用来弥补这部分的经费差额。沃克兰发现即使不包括他们的薪水，每年费用就要达到25268利弗尔，有时需要30000利弗尔才可以使得使馆正常运作。但这项建议并未取得当时海军部长的同意，因为担心摊派费用会令法国商人的积极性受挫。直到1778年，海军部才向领事馆追加拨付了四分之一的经费。

随着海外贸易特权由垄断转向自由贸易，法国商馆在不同阶段出现的管理委员会也由向公司负责转变为向国王负责。而任职的人员由于水土不服、疾病缠身或者薪酬等原因频繁变动，一直以来并未有详细的名录。笔者根据各方材料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sup>⑤</sup>（表3）：

1782年，担任了六年领事的沃克兰去世。副领事魏亚尔代理领事职务，他招聘葛尔博（Galbert）做领事馆译员，薪水每年1000利弗尔；印度公司秘书长考斯特（Costar）的儿子、印度公司前任大班——小考斯特（Fils Costar）为书记官。1783年，领事馆人员做了一次大的调

① [美] 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2卷，第503—504页。

② Henri Cordier, “L’arrivée des Portugais en Chine”, *T’oung Pao*, Second Série, Vol XII, No. 4, 1911, pp. 483 – 543.

③ Louis Dermigny, *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à la Chine*, pp. 148& 155.

④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1883, p. 271.

⑤ 来源：法国海外国家档案馆（FR ANOM C<sup>1</sup> 8 – 16,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 – Mer）；P. Huard&Ming Wong, “Pierre – Louis – Anchille de Robien, chevalier de Robien, dit ‘le chinois’, 1736 – 1792”, *Annales de Bretagne*, Tome 70, No. 3, 1963, pp. 269 – 289；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 II&III, Ernest Leroux, 1883.



表 3 18 世纪广州法国商馆管理机构人员名单

管理机构	任职时间	人员名单	职务
印度公司 管理委员会 (Conseil de direction de la Compagnie)	1769 年 以前	杜蒙 (Dumont)	负责人、第一任大班
		米歇尔 (Michel)	职员
		特洛里 (Trollier)	职员
		狄默德 (Thimotée)	职员、商船大班
		劳郎斯 (Laurenci)	职员
		吉贝尔 (Gilbert)	职员
		沃克兰 (Vauquelin)	职员
		德韦尼 (De Vigny)	商船大副
		狄摩尔 (Montigny du Timeur)	职员
		德罗卜 (De Robien)	时任秘书、大班
王家管理委员会 (Conseil de Direction du Roi)	1770 – 1776	狄默德 (Thimotée)	组建人、负责人、第二任大班
		德韦尼 (De Vigny)	接任狄默德，暂代职务
		德罗卜 (De Robien)	1770 年进入委员会、第三任大班
		克鲁埃 (Clouët)	委员会组建人之一
		考斯特 (Costar)	委员会组建人之一
		德斯图莱尔 (Destourelles)	外科军医，1772 年接任 Beauregard
		巴里 (Paris)	外科军医，接任德斯图莱尔
		瑟毕尔 (Sebire)	职员
		卢罗 (Loureue)	职员
领事馆 (Consulat)	1776—1801	沃克兰 (Vauquelin)	领事
		魏亚尔 (Vieillard)	书记官
		小考斯特 (fils Costar)	书记官
		葛尔博 (Galbert)	第一译员
		小德金 (De Guignes)	第二译员，1787 年 – 1801 年担任领事
		巴里 (Julien Paris)	外科军医
		瑟毕尔 (兄) (Sebire aîné)	职员
		特里安 (Terrien)	商人
		瑟毕尔 (弟) (Sebire cadet)	商人
		西蒙 (Simon)	商人
		布莱特 (Burette)	商人
		贡斯当 (Charles de Constant)	最后一任商务代表
		皮隆 (Piron)	商务代表，贡斯当合伙人

整。原来拒绝领事职位的狄默德及曾三次来过广州的印度公司大班朗特（Lentier）都想来广州领事馆工作，但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个强劲的竞争者——小德金（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而败下阵来。

1785 年，魏亚尔以健康不佳和家庭团聚为由申请卸任回国。在这种情形下，法国海军部就授权昂特卡斯特骑士在广州领事馆调查情况、核减人员，只保留一个代理人和一名翻译。小考斯特以健康状况不佳推辞不就。考虑到小德金精通中文，并在领事馆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昂特卡斯特就建议由小德金身兼两职。小德金上任后，面临着种种危机。1780—1787 年间，法国在广州的贸易处于低潮期，7 年中只有 16 艘商船来广州黄埔港做贸易，<sup>①</sup> 广州领事馆成了法国国内无人关注的一个机构，自然没有充足的经费提供；小德金在任时，境况十分窘迫，甚至旗杆坏了都无钱更换，而在广州竟然没有一个自己的居所，更是让他极为尴尬。

法国当时已经处于大革命前夕，社会动荡，商人和平民对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极为不满，开始反对贵族和教士的特权，法国的封建制度陷于严重危机。1789 年波旁王朝被推翻，随后革命阵营内部又出现了各种斗争，法国政局几经更迭，无暇顾及海外市场。小德金写往国内请求增加经费、购买房屋的信件石沉大海。法国商人在中国的境遇也极为艰难。与欧洲其他国家在中国蓬

<sup>①</sup> Louis Dermigny, *La Chine et l'Occident : 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1719 – 1833, Tome II, 1964, p. 521.

勃发展的贸易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商业贸易一蹶不振。1788 年大班蒙蒂涅（M. de Montigny）率三艘印度公司商船来到广州，遭到在广州英国商人的恶意阻挠，再加上中国商人看到这些法国人居无定所，怀疑他们信用不佳而不愿意与其进行贸易，蒙蒂涅的这次航行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利润。<sup>①</sup> 我们还找到这样一份记录，1793 年 11 月 8 日，香山知县许敦元曾向澳门理事官甘博亚下令，将澳门葡萄牙人擅自扣押的一艘船只交还法国商人。<sup>②</sup>

法国与中国的贸易，与英国、荷兰、美国、丹麦等国相比，渐渐处于劣势，难以在这份利益中获取一杯羹。而这时坚守在法国广州领事馆的代领事小德金依然没有放弃，试图继续维持这个机构的运作。1791 年，小德金写信回国，请求担任领事一职，表示会尽力为法国商人在广州黄埔与他国商人的纠纷中维护本国人的利益，继续保留在商行前升起法国国旗的权利。当年 10 月小德金收到委托书后就职，但薪水并没有增加，不仅如此，他在与其他国家商馆大班的来往中也备受屈辱，英国人认为这个只有着领事的空头衔，依然领着译员薪酬的人没有资格作为法国政府在广州商馆的代理人。随着英国人占领本地治里（Pondichéry），从 1793 年起小德金就没有再收到过任何经费，他被迫在 1796 年去了法国岛，后又去了马尼拉，于 1801 年乘坐一艘丹麦船回到了欧洲。1790 年 4 月，法国东印度公司被解散，随后重新组合变成一个私有公司，在广州的商馆也随之被拍卖，由曾担任印度公司大班的贡斯当和皮隆（Jean-Baptiste Piron）竞价购得。1793 年 1 月，贡斯当将房屋全权转交给皮隆，并留下约 1,416 皮埃斯特作为商馆运作经费，离开广州返回欧洲。<sup>③</sup> 1804 年，皮隆<sup>④</sup>去世，法国商馆就此落下帷幕。法国传教士苏振生（Jean François Richenet）在 1817 年 8 月 3 日的报告中记录了以下情况：

法国人曾经有一个商行。在印度公司解散时，即大革命前夕就被拍卖。由印度公司前大班贡斯当和皮隆二人购得。两人随后离开广州，皮隆在 1802 年底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返回，但他只是得到法兰西岛（île de France）政府的授权任命。他将商行重修，并升起了国旗。但他在 1804 年底不幸去世，并作为贡斯当的债务人，将商行抵押给了贡斯当，于是贡斯当成为商行唯一的所有人。我并不清楚贡斯当是否将之卖给了某个英国人，接下来是由一位英国人照看商行，并分租给几位商船船长。因为贡斯当——这位日内瓦人彼时已经在英国定居数年了。<sup>⑤</sup>

### 三、法国商行各阶段管理机构的主要活动

法国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以及后来的王室管理委员会在处理商业贸易方面发挥着作用，而由国王下令设立的广州领事馆则不仅在贸易方面，亦在政治、宗教等方面保护本国国民，维护国家利益。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奏请下，清政府批准了其所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总为五条：

一，夷商在省过冬，应请永行禁止；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三，借领

---

① FR ANOM C<sup>1</sup> 16 folios 110 – 118, Archives Nationales d’ Outre – Mer.

② 刘芳、章文钦编：《香山知县许敦元为饬将所查封法船货物交还事下理事官谕》，《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基金会，1999 年，第 673—674 页；〔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 2 卷，第 531 页。

③ Louis Dermigny, *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à la Chine*, p. 91.

④ 据德尔米尼所整理的《有关中国贸易的贡斯当回忆录》，贡斯当是法国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最后一任商务代表，而皮隆则为其朋友及合伙人（Louis Dermigny, *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de Constant sur le commerce à la Chine*, 1964, p. 12）。

⑤ Henri Cordier, “La Reprise des Relations de la France avec l’ Annam sous la Restauration”, *T’ oung Pao*, Second Séries, Vol 4, No 4, 1903, p. 293.

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四，外夷雇人传递信息之积弊，宜请永除；五，夷船进泊处，应请酌拨营员弹压稽查。<sup>①</sup>

在这种情形下，法国商行的管理人员及一些前来贸易的个体商人就不得不在澳门居留很长时间。但是有些法国商人在澳门过冬期间惹是生非，屡屡与葡萄牙人发生冲突。1785年，时任葡萄牙澳门总督的法里亚（Bernardo Aleixo Lemos de Faria）下达私令，禁止法国大班们冬季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居留。消息传回法国后，海军部立即与凡尔赛的葡萄牙大使苏扎（Souza）交涉，经过协商，果阿总督收回了其下属澳门总督的这道私令，此事才得以解决。1787年，昂特卡斯特骑士（Chevalier d'Entrecasteaux）在海军部长授意下，借口前去确认在澳门的法国人是否可以如同其他欧洲人一般自由出入，前来中国，但其真实意图是向中国人传递消息，让他们明晓英国人对这个帝国的觊觎之心。<sup>②</sup>出发之前，他给北京宫廷的法国传教士写了一封信：

为了国王及传教事业，也为了中国人，请阁下向北京朝廷申请允许梁栋材（Jean Joseph de Grammont）在广州居住。没有这位传教士的帮助，我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我尚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需要他继续予以协助。我已经向海军部长极力陈情并得到他的同意，希望你们能够帮忙促成此事。梁栋材性格谨慎，才思敏捷，与英国人在领土以及亚洲海域进行交涉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故而我们可预见，他居留广州必定会维护中国人的利益，也会促进我国与中国共建联盟，甚至在我们与英国在印度和亚洲市场的竞争都大有裨益。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不了解，有些事情会对他们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但其惘然不知；英国人企图垄断在中国的贸易，在大幅增加前往中国进行贸易的船只的同时，想将威胁他们野心的其他国家驱赶离开。从我指挥船只进入珠江口时看到的情形来判断，他们已经探查了中国所有海岸，尤其是北直隶（Pé - Tche-li）海湾。那么一旦形势有变，他们就可以长驱直入，攻占北京。梁栋材神父居住在广州，一则并没违反（中国）皇帝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命令，二则他会设法将英国人沿着中国海岸建造房屋的真实意图上报（中国）皇帝……

1782年新年前夕，昂特卡斯特<sup>③</sup>

1787年2月15日，梁栋材在广州写信将英国人的意图告知在北京宫廷的汪达洪（Jean Mathieu de Ventavon），让他寻找合适时机上报给皇帝。<sup>④</sup>汪达洪当时在宫中为乾隆皇帝的画师潘廷章（Guiseppe Panzi）做翻译，同时还是宫中的钟表师，有机会见到皇帝，但此事在汉文档案中并未见记载。除此之外，昂特卡斯特还在法国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前去广州府衙商讨设立厦门商行，但无功而返。<sup>⑤</sup>不过，法国广州领事馆在维护本国商人和国家利益方面，毋庸置疑起着一定的作用。

广州领事馆与当时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协同为法国争取在中国的利益。领事沃克兰在1778年2月8日在广州写给海军部长的信件中提及：

中国皇帝希望得到一块镜子用来装饰他的宫殿，故而我们法国人询问可否从法国运来此物。这种要求对我们来讲非常荣幸，因为这往往会给我们国家带来诸多利益。我相信阁下会将此事妥帖办好，具体尺寸如下：

高……………87寸

宽……………72寸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古籍研究所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6—338页。

② FR ANOM C<sup>1</sup> 16 folios 41 - 42,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 - Mer.

③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pp. 122 - 124.

④ FR ANOM C<sup>1</sup> 16 folio 70,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 - Mer.

⑤ FR ANOM C1 16 folios 41 - 42, Archives Nationales d'Outre - Mer.

1779年1月22日信件：

阁下：

中国皇帝连发三封信件催促广州总督询问我是否在去年就已经写信给您谈到他想从法国拿到两面镜子用以装饰宫殿。他已经没有耐心等待，想尽快收到这两件物品。另有一事，中国皇帝交由德罗卞回国时带回的珐琅涂金铜花瓶图纸，是否已经在巴黎让人做好，这是皇帝为他一年半前仙逝的皇太后订制的礼物，希望能告慰她的亡魂。如若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中国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悦，这对我们也极有好处。故而，阁下，我请求您下令让印度公司的负责人或其他相关人员从速完成此事。<sup>①</sup>

这些信件都得到了法国海军部的积极回复，对乾隆皇帝订购物品的要求尽量满足。1783年法国在巴黎为中国皇帝购买的两面镜子由圣马洛运往广州法国领事馆，镜子连同包装费、运费及船员的费用就达11 416利弗尔；而1779年依照乾隆皇帝命令将凯旋图（即《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在法国做成铜刻版的费用，也是由公行（Co-hang）先行给法国领事馆价值18 800利弗尔的抵押物，再在1781年交付10 000皮埃斯特给东印度公司，这笔钱中的一半用于广州法国领事馆的开支。蒋友仁（Michel Benoist）就在1773年写回法国的信件中谈到：“在广州的几位法国人给我寄来一份函件”<sup>②</sup>交涉得胜图的印刷问题，他与钱德明为此将乾隆皇帝的意见转达给广州承办的法国人，我们在此可以推测出，虽然他信件中并未指明是何人，但就高第提供的资料来看，应该是当时在广州的商馆人员。

除了为维护法国在中国的利益所作的努力，广州领事馆也为法国传教士在澳门和内地的传教经费的传递提供帮助。1782年12月，时任澳门巴黎外方传教会账房总司库的德斯古维尔（Jean Joseph Descourvières）出具了一份证明：

兹证明本人，澳门巴黎外方传教会账房总管，从副领事魏亚尔处收到766皮埃斯特。本人曾在澳门将这笔钱委托广州的法国领事沃克兰转交广州传信部账房，但因前领事先生去世而未能实施。

澳门巴黎外方传教会财务管理处

1782年12月30日<sup>③</sup>

领事馆也为法国公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前来远东的商船在海上遇险时，它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在一些法国船只失事后参与后续处理。1779年，领事馆通过法国船只“玛丽-玛德琳娜号”（Marie-Magdelaine）就为17名欧洲遇险人员购买所需救援物品；在1782年的领事馆账目中，我们也发现就有1200皮埃斯特是副领事魏亚尔为法国囚犯Laval, David, Desvaux, Boisdizon, Binquert, la Mothe及Guibert支付的房租费用，这些人将由英国人带至广州后乘船返回英国。<sup>④</sup>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法国广州领事馆还在其他国家之间产生纠纷时提供协助，遏制英国企图在华贸易中一国独大、阻拦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野心。1784年，在独立战争后，美国派出以萨缪尔·肖（Samuel Shaw）<sup>⑤</sup>为首、格林（John Green）为船长的船队，驾驶“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来到广州黄埔港，却不料不仅要遭受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种种刁难，还要面对英国人的诡计。英国人利用这些美国人初来乍到、语言不通的境况，在中国官员面前妄言说这些

①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pp. 91-96.

② [法]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VI》，郑德第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③ Henri Cordier, *La France en Chine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Vol. II, pp. 149-150.

④ Ibid., pp. 221-223.

⑤ 萨缪尔·肖（Samuel Shaw），曾在美国解放战争中担任炮兵军官，是第一个前来中国做贸易的美国商人。1784年，带领“中国皇后”号船队，满载花旗参前来广州黄埔港交易中国红茶。1786年成为美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



人是 大不列颠 的子民。<sup>①</sup> 美国人 深陷 窘境，求助于 法国 领事馆 领事 魏亚尔：

我们，前来 中国 贸易的 美国 商务 大班，请求 您 知晓 以下 这种 情况，由于 潘启官 (Pankekoa) 的 歪曲，在 向 户部 呈文 中 将 我们 视为 英国 人，前来 此地 的 船只 亦 被 认为 是 英国 船只，因此 导致 一 应 事务 尽 归 大不列颠 国 管辖。

我们 向 您 提出 恳切 的 请求，希望 可以 扭转 如此 谬误，向 中国人 表明 我们 是 一个 自由、独立 的 主权 国家。我们 以 美利坚 合众 国，法国 国王 陛下 盟友 之 身份，请求 您 派遣 皇家 译员 葛尔博 先生 向 中国人 转达，我们 是 美国 人，来自 一个 自由、独立、拥有 主权 的 国家，与 大不列颠 毫无 关系，并不 效忠 于 它 或 其他 任何 国家，我们 属于 独立自主 的 美联邦 政府。故 特此 请求 中国人 可以 明晓 我们 的 诉求，承认 并 接受 我们 所持 的 护照。<sup>②</sup>

18 世纪 设立 的 法国 广州 领事馆 虽然 并不 属于 严格 意义上 的 具有 两 国 外交 层面 交流 作用 的 机构，但 它 在 维护 国家 利益、为 本国 商人 在 华 生活 及 贸易 往来 等 方面 发挥 着 积极 的 作用。随着 国内 大革命 的 爆发，以及 法国 在 海外 霸权 中 与 英俄 等 国 之间 战争 的 失利，东 印度 公司 解散，其 在 华 管理机构——广州 商馆 也 随之 退出 了 历史 舞台。1832 年后，法国 重新 在 广州 设立 领事馆，但 无论 形式 或 意义 都 发生 了 根本 变化，与 本文 所述 的 法国 商馆 有着 本质 区别。

## 结 语

法国 东 印度 公司 为了 开拓 海外 贸易，更好 地 开展 与 中国 的 商贸 活动，在 广州 设立 了 商馆，其间 历经 了 由 东 印度 公司 设立 的 管理 委员会 到 法国 国王 和 海军 部 直接 管辖 的 领事馆 这一 过程。商馆 的 设立 及 兴衰 都 与 法国 国力 的 消涨 息息 相关。在 18 世纪 下半 叶，由于 法国 在 与 英国 的 海外 战争 中 失去 了 欧洲 强国 的 地位，再加上 国内 社会 各 阶层 发动 大革命，政局 跌宕，导致 其 在 中国 的 贸易 大幅 下滑。本文 依据 保存 在 法国 海外 国家 档案馆 中 的 东 印度 公司 来 华 贸易 档案 及其 最后 一 任 商务 代表 贡斯 当 的 回忆 录 等 原始 材料，结合 前人 的 一些 成果，梳理 法国 来 华 贸易 船只、商馆 管理机构 职员 及 职能 变动 等 情况，试图 还原 清代 法国 东 印度 公司 在 华 贸易 中 的 真实 情况，以期 读者 更 全面 详尽 地 了解 中法 两国 的 早期 经济 贸易 发展 史。

## References

- Consigny, Charpentier. *Journey in Guangzhou, capital of this province in the same name in China, through Korea, the Cape of Good Hope and Mauritius and Reunion Island*. Paris: Chez André, 1798.
- Cordier, Henri. "The hang merchants in Guangzhou." *T' oung Pao* 2. 3 (1902).
- Cordier, Henri. "The resump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Annam during the Restauration." *T' oung Pao* 2. 4 (1903).
- Cordier, Henri. "The Americans and Frenchmen in Guangzhou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ist Society* 2. 1 (1898).
- Cordier, Henri. "The arrival of Portuguese in China." *T' oung Pao* 2. 4 (1911).
- Cordier, Henri. "The French Consulate in Guangzhou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T' oung Pao* 2. 9 (1908).
- Cordier, Henri. *The France in China in the 17<sup>th</sup> century : Archives of trade : East India, China and Cochinchina*, Vol. I, II, III & IV. Paris : Ernest Leroux, 1883.
- De Montigny, Charles. *Manual of the French Merchants in China, or Trade in China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① Henri Cordier, "Américains et Français à Canton au XVIII<sup>e</sup> siècle",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méricanistes*, Tome 2, No. 1, 1898, pp. 1-4.

② Josiah Quincy,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Crosby and H. P. Nichols, 1847, p. 193.

French. Paris : Imprimerie de Paul Dupont, 1846.

Dermigny, Louis, *Memoirs of Charles de Constant on the Trade in China*, Paris: S. V. E. P. E. N. , 1964.

Dermigny, Louis.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rade in Guangzhou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1719-1833, Vol. II, Paris: S. E. V. P. E. N. , 1964.

Du Halde, Jean-Baptiste, eds. *Yesu huishi zhongguo shujian ji* ( The Enlightening, Curious Letters Written by the Jesuits ), Translated by Zheng Dedi. Vol. VI. Zhengzhou: Daxiang chubanshe, 2005.

Huard, P. and Ming Wong. “Pierre-Louis-Anchille de Robien, chevalier de Robien, called 《 a Chinese 》 ( 1736-1792 ). ” *Annals of Bretagne* 70. 3 ( 1963 ).

Liu Fang and Zhang Wenqin, eds. *Putaoa dongbota danganguan cang qingdai aomen zhongwen dangan huibian* ( The Chinese archives on Macao in the Portuguese Pautas Archives Establishment ). Macao: Macao Foundation Press, 1999.

Marchand, Etienne.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during 1790, 1791 and 1792*, Vol. III. Paris : Chez Bossange, chez Charles Pougens et chez Duprat, 1800.

Morellet, Abbé. *Memorandum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India Company*. Paris : Chez Desaint, 1769.

Morse, H. B. *Dong yindu gongsi dui hua maoyi biannian shi* (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 Translated by Ou Zonghua.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1991.

Mureau, Milet. *Voyage of La Pérouse around the Wor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ree of April 22, 1791*. Paris : De l’ Imprimerie de la République, 1797.

Orange, James. *Zhongguo tongshang tu* ( Pictures relating to China, Hong-Kong, Macao, 1655-1860 ), Translated by He Gaoji. Beijing: Beijing ligong daxue chubanshe, 2008.

Pelliot, Paul. “The Beginning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the First Voyage of Amphitrite in China. ” *Scholarly Journals*. Vol. 10, 1 ( 1928 ).

Quincy, Josiah. *The Journals of Major Samuel Shaw, the First American Consul at Canton,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Boston: Crosby and H. P. Nichols, 1847.

## **A Study of the French Factory in Guangzhou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XIE Jiangho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nan University; xiejulia@163.com )

Established in 1644 the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was not content to lag behi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company made active efforts to trade in China with the backing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The foundation, evolution and closing of the French Factor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keen overseas competition between France and the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especially England, and also to its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French Factory had a common experience with the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umber of boats which came to Guangzhou and the supercargoes of the French Factory analyzing the original statistics in the case records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picture of prosperity in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